

丁
东
著

和 友人 对话

味
文
人
故
事

▽高处不胜寒
▽顾准精神的当代意义
▽话说王蒙
▽为什么怀旧
▽校庆应该庆什么
▽几位著名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
▽世纪的主旋律
▽漫谈两种畅销书
▽自由撰稿人：一种新的文化角色
▽关于文革中的地下文学
▽〈十日谈〉：现代性文化的萌芽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三人谈
▽良知的旅程
▽漫谈室内剧

◎ 求索文丛

CHANGCHUNHUBANSHE

▽士人格：一个世纪的回顾
▽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
▽学术的规范化与学者的独立性
▽当代知识分子与文化媒体变革
▽荣国府 宁国府 大观园
▽男性的坟墓和女性的炼狱
▽神的压抑
▽钱的诱惑
▽人的升华
▽男爵 贵妇 守林人
▽红卫兵
▽老二届
▽老五届

丁
东 著

和友人对话

◎ 求索文丛

◎ 長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和友人对话

丁东 著

责任编辑:邓 进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11.75 插页:5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0 000

印数:1—8 000 册

ISBN 7-80604-604-6/I·129

定价:17.00 元

序 言

丁
东

这本书是8年来我和朋友们交谈后记录整理成的一些文字。

对话和访谈，如今已经是一种流行的表达方式。我平时阅读就有这样的体会：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读起来就比较累，往往得正襟危坐，才能入境。而以对话或问答的形式出现，阅读的心情就会愉快得多。其实，这种方式古已有之。从中国的孔子，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中西先哲都用这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思想遗产。

我之所以乐于和朋友们对话，倒不是故意想要模仿先哲，而实在是觉得这种方式与个人单独写作的感受大不相同。几个朋友围坐在录音机前，围绕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各抒己见。思想的闸门打开之后，彼此互相启发，互相碰撞，许多新的观点就会跳跃出

来。刘禹锡的《陋室铭》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们虽不是鸿儒，但古代文人的这一乐趣，我们同样可以拥有。

这些对话的记录当然不如文章结构完整，逻辑严密。但文章一经修改，就把思维过程中不成熟的地方覆盖了，而对话不但可以记录思维的最终结果，也可以展示思维的过程本身。也许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正是有意思的想法。对话的形式，可以说事，也可以说理，来回穿插，比较自由。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用不着起承转合。所以，如果说论文是让人坐在书房里读的，对话则可以躺在床上翻。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和山西的朋友们的对话录。邢小群是我的妻子。高增德、阎勤民、智效民、陈坪都是我所供职的山西社会科学院的同事。谢泳、赵诚、贾秀文虽然和我不在一个单位，但也是山西知识界中谈得来的好友。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经常和邢小群、陈坪一起讨论一些有关当今文学艺术的话题。当时，邢小群在山西大学教中国当代文学，陈坪在山西社科院文学所研究的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讨论对象的选择随机性很强。一起看了美术展览，就讨论美术展览；一起看了电影，就讨论电影。主要是为了完成报刊的约稿，没有更系统、更长远的设计。

阎勤民和我讨论的是中外小说名著。时间是

1991年到1992年。当时,我对现实的文化表达刚经历了一次失语,所以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古代和外国。我给自己设计的选题是小说与性文化研究。先后搞了《金瓶梅》、《红楼梦》、《十日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几个专题。阎勤民原来专攻《孙子兵法》和《聊斋志异》,对我感兴趣的选题,他也感兴趣,于是经常一起谈论。可惜,两个人的当时谈话没有录音。而是一人事后整理成文,另一人修改补充,所以失去了当时的谈话气氛。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原来我们也想从性文化的角度切入。但一进入,就发觉首当其冲的不是性文化,而是关于“媚俗”。这个命题,又把我的目光从古代和外国拉回到中国的现实。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我和高增德、谢泳的对话。这些对话的多数是在高先生家那间号称“速朽斋”的书房里进行的。话题围绕着我们共同感兴趣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展开。高增德先生专攻中国现代学术史,资料积累十分丰富,本世纪几乎所有的重要的学者,他都建立了学术档案。他离休前是《晋阳学刊》主编。这本学术杂志在他主持期间曾为学术界刮目相看,如今已经雄风不再。谢泳在山西省作家协会供职,80年代曾热衷于研究当代报告文学。90年代转入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他比我年轻,读书很多,但绝无迂腐的学究之气,常常能从当代的文化现象中提

出具有思想幅射力的问题。最初我曾和他就共同关注的文革中的地下文学进行过探讨,后来又把这个话题扩展到文革时期的民间思想文化。高先生参与进来,又把讨论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乃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3人第一次对话谈的是王蒙。当时中国文坛上“二王之争”烽烟初起。我把讨论的情况告诉了当时担任《东方》副主编的朱正琳,他颇感兴趣,不到两个月登了出来。登出来以后,引发了更多的反馈。从此我们的讨论便一发不可收拾。对知识分子问题同样有兴趣的智效民、赵诚、贾秀文间或也参加了讨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一旦钻进去,就发现可说的事情太多,说也说不完。20世纪虽然还没有完结,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包括命运史和心灵史,注定要成为一门显学。

本书中还有一些对话和访谈是在北京进行的。比如我和中央音乐学院蔡仲德教授的对话,就是在冯友兰先生的故居三松堂里进行的。蔡教授是冯先生的女婿。我读了他著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发表了一则随感,他看到以后,要和我交换意见,由此相识。见面聊起来,才知道蔡先生近几年也在研究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叫士人格研究。于是,我们也作了一次对话。

书中还有两篇是对77届大学毕业生的访谈录。

这个题目是光明日报出版社徐晓策划的。今年是恢复高考第20年。77级大学生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自己也是这一届，读的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我不想把这个历史事件的含义简单化，因此，我选择的两位访问对象都有自己对历史的思考。

魏光奇和我是插队时代的朋友，他也是一位民间思想者，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教历史。我们现在仍然经常讨论各种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不过整理出来的不多，以后也许会多起来。

长春出版社策划出版“求索文丛丛书”。将我和朋友的这些对话和访谈列入其中。的确，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文化事业的求索者。我们愿意继续履行自己的角色，直到下个世纪。

1997年6月20日

目 录

和 友 人 对 话

- 序 言 / 1
- 几位著名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 / 1
- √ 高处不胜寒 / 11
- 顾准精神的当代意义 / 23
- √ 话说王蒙 / 35
- 告别御用的悲剧 / 45
- 士人格：一个世纪的回顾 / 56
- 校庆应该庆什么 / 71
- 学者的规范化和学者的独立性 / 80
- 当代知识分子与文化媒体变革 / 89
- 为什么怀旧 / 96
- √ 自由撰稿人：一种新的文化角色 / 106
- √ 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 / 122
- 漫谈两种畅销书 / 136
- 世纪的主旋律 / 151

目 录

和 友 人 对 话

- 红卫兵 老三届 老五届 / 173
- 民间思想者的心路历程(一) / 187
- 民间思想者的心路历程(二) / 198
- 夏知的旅程 / 215
- 在信仰的档案里 / 224
- 关于中国文革中的地下文学 / 238
- 《顽主》三人谈 / 249
- 漫谈室内剧 / 256
-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三人谈 / 263
- 《十日谈》:现代性文化的萌芽 / 274
- 荣国府 宁国府 大观园 / 290
- 男性的坟墓和女性的炼狱 / 304
- 男爵 贵妇 守林人 / 329
- 透视媚俗 / 348
- 神的压抑 钱的诱惑 人的升华 / 364

几位著名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

* 谢泳：10几年来，中国发生过许多大事。每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总想听到来自知识界的声音，特别是那些文化名人的声音。因为他们代表着民族文化的精华，象征着人文理想和正义。我想，不止是我这样的年轻人有此心愿，就是中年人和老年人也是如此。由于我在文学界供职，所以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学界的几位名人，他们是刚去世的夏衍和健在的冰心、巴金、萧乾和曹禺。因为他们的经历几乎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历程，所以他们最有资格表达世纪的声音。

高增德：我想从他们的声音中，提出一个命题：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这几位作家，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早在本世纪前半叶就已奠定。他们在各自领域里的成就，早已载入文学和文化的史册。谢泳提出的问题，不是要对他们的文学成就重新作出什么评价，而是想把他们当作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讨论他们晚年如何承担知识分子的特殊职能。

丁东：我们不妨先作一点具体分析。巴老自 80 年代以来一直提倡讲真话。他的《随想录》震撼着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他对历史的反思偏重于忏悔个人在历史中被扭曲的悲剧。他说，“反思是痛苦的，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为‘驯服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当然，能够在暮年‘觉今是而昨非’，开始清醒过来，总比浑浑噩噩地活下去要好一点。”他倡议的“文革博物馆”，至今还不能为现实所接受。但近几年，巴老对当前现实没有再表达什么，这当然与他健康状况有关。他写作已很吃力。但还是能多少写一点，我们能看到的文字，基本上谈论的都是自己的作品以及作品涉及的一些往事。即使对文学界的事说一点话，也不像 80 年代的《随想录》那么激动人心了。

在这方面，冰心虽然比他年龄更长，却更多地保持着抗争。她早年《春水》、《繁星》的世界是纯美的，晚年关注的却是天下的命运，尤其是教育的命运。她写作了 70 多年，文章从来不曾被编辑删改。进入 90 年代，应《北京晚报》之邀作了一篇短文，却被删去一段。可见其批判精神之一斑。萧乾曾说：“冰心大姐，我认为最应当学的是她那根植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

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才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老年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冰心大姐这样敢于讲点不中听的话的作家，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 夏衍晚年的反思，不限于文艺领域，而是切入整个体制和整个革命过程。李辉把他和周扬进行了对比，说，“夏衍和周扬显然不同。周扬也进行过历史反思，他与夏衍一样感慨过以往‘左’的做法和教条主义作风，但他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他的自我忏悔。”“夏衍的自信与执拗，使他与众不同。显然他基于这样一个看法，在历史的演进中，个人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他反思，是立足于一个共产党员对整个党的事业的反思。他不认为个人可以改变历史，因此，他认为在党犯错误的时候，个人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在于从整体上认识历史，避免历史错误的重犯。”在这方面，应该说，夏比周更深刻。

萧乾近几年来声望达到了他一生的最高点。这主要不在于他晚年在文学翻译方面仍保持着创作活力，而在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现实问题的表达。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时候，中国各界发表的文章数不胜数。但在我看来，只有萧乾和年轻的葛剑雄的文章最为深刻。他们对胜利的一

方的历史失误的分析，发人深思，堪称警世。萧乾和王彬彬之间就知识分子在高压状态下是否应当保持沉默发生了争论。我理解，萧乾作的是历史判断，讲的是当时知识分子只能怎样，历史责任应当由谁来负；王彬彬作的是价值判断，着眼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说真话有风险时是否应当满足于沉默。衡量历史，我觉得萧乾有道理。但在现实环境中，王彬彬的意见不是苛求。况且萧乾今天的价值，正在于他没有沉默。

至于曹禺，则很少听到他的批判性的声音。这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倒听说，他在上海看戏，每见一部新作，都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作品”。只有吴祖光对他后半生的教训作了剖析，他表示诚恳接受，算是清醒之见。而臧克家，连这点表示都没有，所以就不谈他了。

谢：提出著名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当我们对某一知识分子的晚年作出判断的时候，应当非常谨慎。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我们了解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他的作品和别人对他的采访。而进入传媒的东西，是有局限的。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切近他们的全部实际。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每个人都有他的心路历程。而表现在公众面前的，有时不是他们真实的内心，

有时不是他们全部的内心。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讨论这几位著名知识分子，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就说巴金，他这几年很少说话，这是事实。但问题不在于他说多说少，而在于他沉默之后，一旦开口，说的是什么。1995年巴老在《文汇报》发表了3篇序文。这是一年来仅见的文字。这些文字远离现实，但透露出来的情绪，仍然有让人深思的东西。寡言少语，也是一种选择。巴金的沉默，固然与年龄和健康有关，但也与心境有关。一位熟悉巴老情况的朋友告诉我，80年代中期，巴老也有过高官登门造访而一言不发的事。那年三联书店要出版巴金致杨苾的书信，由于书中涉及到一些犯忌的人物，出版社要求巴金撤下一封信，但巴老坚决不从，而是作了一些技术处理。1987年三联版的《雪泥集》第77页是撕下来后重新贴上去的。虽是一件小事，但可见出巴老的风骨。

高：说到晚年境界，我们不能就他们的晚年情况就事论事，应当把眼光放远，联系他们的早年经历、教育背景和一生的政治选择、文化追求作通盘的考察。这样才能对他们晚年已经达到和尚未达到的境界作出恰当的评价和理解，并且在这种评价和理解中，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径。这几位著名作家，都是在1900年到1910年间出生的。

冰心、夏衍年纪大一些，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另3位是五四精神的第一代承受者。从教育背景上看，冰心留美，夏衍留日，巴金留法，萧乾留英，曹禺毕业于清华，后来曾到美国访学。除了夏衍早年参加革命，成为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其他几位年轻时代都是崇尚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按一般逻辑，自由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专制造成的精神扭曲更加反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作为当年左翼作家的夏公，比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对体制的反思更为深刻，表达更为无忌。我想，这只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次政治运动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灵创伤是何等严重。萧乾是右派，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被打成右派。巴老和曹禺在50年代虽然没受冲击，还担任一些荣誉性职务，但5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被体制当作二等公民，始终处于理不直气不壮的客位角色，思想改造没跑，指点江山没份。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和经常性的思想改造中，都经历过真诚地或被迫地自我否定的精神历程。而夏衍则没有这一过程。对知识分子来说，心灵受伤有两种结果，一是受伤害越大，反思动力越强。一是受伤害越深，恐惧感越强。如果忽视后一种效应，许多现象就说不清楚了。有些自由知识分子，早年人格是独立的，后来不得不放弃独立人格，晚年又开始恢复，但因

*

受过伤害，找回早年的风采难度更大。他们经历几十年的炼狱，要想走出阴影，需要双倍的勇气。夏衍之所以不着重自我忏悔，而着力反思体制性的痼疾，是因为他多年参加体制运作，知道体制的厉害。形势比人强，谁在其间也很难做到不变形。所以反思的重点放在体制本身。

谢：说实话，晚年境界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但我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说法。人的境界有高有低。现在我们讨论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我想主要是说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在晚年对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有无明确态度，是否主动承担着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二是他们对近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从总体上持什么态度，有没有独立的认真的反思。我觉得，谈晚年境界，主要是把握这些大的方面，而不是挑剔细枝末节。

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晚节的，有所谓盖棺论定之说。它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难免失误，但在晚年却能对失误作出反省。人到老年，就可以对身外之物，功名利禄，看得比较淡，对外界压力的恐惧感也相对降低，说真话的顾忌较少。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也是这个道理。赵丹临终，才说出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样的真言。冯友兰走过的弯